

我国古代 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钮仲勋 著



测绘出版社

6
8
011

我国古代 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钮仲勋 著

测绘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我国古代对中亚地区的地理考察和认识，着重介绍我国古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如张騫、法显、宋云、玄奘、杜环、耶律楚材、邱处机、陈诚等人在中亚的考察活动及我国古代地理名著中所反映的对中亚的地理认识。内容丰富，史料充实，为研究中亚史地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可供地理、历史、考古、图博、旅游等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上述专业的科研工作者参考，亦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阅读。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钮仲勋 著

*

测绘出版社出版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3.875·字数 82 千字

1990 年 2 月第一版·199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900 册·定价 4.20 元

ISBN 7-5030-0366-9/K·128

前 言

中亚地区，虽气候干旱，地形复杂，但在历史上居欧亚交通要冲，是世界古代文明荟萃之地，对世界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来与中亚有密切关系。在我国版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在地理上属于中亚范围。我国古代人民很早以来就在中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察，写了游记或地理著作，留下了许多有关地理的翔实记载，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对中亚的地理认识，而且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当前，探讨中亚史地问题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但其研究多侧重中西交通史、民族史、文化史等方面，对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的研究则较少。前人虽对我国古代在中亚的旅行家与这一地区有关的古代地理著作进行过研究，也发表过一些论著，但多侧重旅行路线的考证及有关著作的校勘，对地理考察和认识则涉及较少，因此，对地理考察和认识进行探讨，还是很有意义的。个人在长期从事西域史地和地理学史研究的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在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作过一些研究，现试图对其进行初步的总结，深信这一总结对中亚史地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缘起。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由于当时中西交通未充分开辟，认识比较初浅；第二阶段，自张骞通西域至清初在新疆之测绘以前，此一阶段，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

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活动，认识逐渐深入；第三阶段，清初在新疆进行测绘并考察山川地名，认识进入新的阶段，本书大致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论述的。本书共分六章，起自先秦，迄于清代中期。清代后期已进入近代，不属古代范畴，故不作论述。

历史时期中亚地区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在学科范畴上属地理学史，但其内容与历史地理、中西交通史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充分反映了相邻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个人虽研究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有年，对中西交通史亦有所涉猎，但对这一涉及诸多学科的问题的研究，自知功力有限，力不从心，撰写本书也只能说是抛砖引玉，尚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在个人从事研究中亚地理考察和认识的过程中，曾多次得到复旦大学章巽教授的热情帮助，值本书撰写完成之际，谨此表示感谢。在筹划本书出版时还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平、张义丰同志的帮助，叶池同志为本书清绘插图，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钮仲勋，江西省九江市人。
1928年12月出生。195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196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研究，在历史边疆地理、区域开发、环境变迁、地理认识、古代天文大地测量、古代地图等研究领域方面作过较多的研究工作，并发表过不少的论文。主要论文有《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开发》、《准噶尔西北疆域考》、《我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及其成就》、《我国古代天文大地测量发展及取得成就的原因初探》、《郑和远航以前中国人在南海之航行与地理认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影响》。

10076-13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两汉	(1)
一、先秦时代我国对中亚的地理认识.....	(2)
二、张騫通西域及《史记·大宛列传》.....	(4)
三、班固的《汉书·西域传》.....	(9)
四、甘英的西行和班勇的《西域记》.....	(1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	(21)
一、法显西行与《法显传》.....	(22)
二、宋云、惠生西行.....	(26)
三、《水经注》所反映对中亚的地理认识.....	(29)
第三章 隋唐五代	(36)
一、裴矩的《西域图记》及其对中亚的 地理认识.....	(37)
二、玄奘西行与《大唐西域记》等书所 反映对中亚的地理认识.....	(40)
三、杜环的西行与《经行记》.....	(51)
四、高居海的西行及其《行记》.....	(54)
第四章 两宋、辽、金	(60)
一、继业《行记》与《西天路竟》.....	(60)
二、王延德的西行及其《行记》.....	(62)
三、乌古孙仲端及其《北使记》.....	(65)
第五章 元代	(69)
一、耶律楚材与《西游录》.....	(70)

二、丘处机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75)
三、常德与《西使记》	(80)
四、《元经世大典地图》及其所反映对中 亚的认识	(83)
第六章 明清	(89)
一、陈诚与《西域行程记》	(89)
二、《使准噶尔行程记》	(92)
三、乾隆年间的测绘	(95)
四、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	(100)
五、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	(104)
六、徐松的《西域水道记》	(106)
结语	(114)

第一章 先秦两汉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认识，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约在春秋末到战国初成书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的传说，自古虽对其疑信非一，但多少可以反映先秦时黄河中上游地区与中亚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交往的基础上，使人们对中亚的一些大河、大湖、大山有初步的认识。如战国时代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已提到塔里木河、开都河（敦薨之水）、罗布泊（渤泽）、天山（敦薨之山）、昆仑山、帕米尔（春山）等。战国时代的另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和《楚辞》中的《招魂》及《大招》都记载西有“流沙”。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这是有信史可考的我国古代对中亚的第一次地理考察，获得了有关中亚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其意义非常重大。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的见闻来写的，这一地理著作将张骞对中亚的地理认识基本上反映了出来。张骞通西域后，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逐渐打开，使者和商人往来络绎不绝，中西交通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随着西域都护的建置，屯田的开辟，水利的兴修，促进了地理认识的迅速发展。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基本上反映了通西域以后西汉一代对中亚的地理认识，其记载内容比《史记·大宛列传》丰富得多，这说明地理视野有所扩大。

公元一世纪后期至二世纪初，班超在西域进行活动，使汉代在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得以继续发展。班超曾派甘英

出使大秦(罗马)，他经历中亚广大地区，抵安息（在伊朗高原）条支（在两河流域）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虽未能到达罗马，作为中国旅行家之出现波斯湾头，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班超的儿子班勇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西域记》，后来，范晔在撰《后汉书》时将其全部收入《西域传》。因其成书在后，有些地方较《汉书·西域传》为详，反映了当时地理认识较前有所发展。

一、先秦时代我国对中亚的地理认识

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和中亚远古民族就有着交往，产生对中亚初浅的地理认识，这种初浅的认识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禹贡》、《楚辞》等古籍中有所反映。

《穆天子传》是晋代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的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籍之一，作者不详。晋郭璞作注。关于它的发现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晋书·律历志》上说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书·束皙传》说在太康二年（281年）；《晋书·武帝纪》说在咸宁五年（279年）。书凡六卷^[1]，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丧仪。关于这部书的成书时间，前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是周穆王时^[2]，有认为是战国时^[3]，甚至有认为是东汉时所作^[4]。王范之根据该书的干支纪日和一些特殊词语的使用，推想成书时间大致在春秋末到战国初^[5]，其说较为可信。

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的西行大致是由宗周（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出发，北经现在的山西，出雁门，西北溯河水，经现在的内蒙、宁夏而达甘肃；再西出玉门入

新疆，逾天山西北而南还，东南复经甘肃的西北，再东过弱水，穿宁夏南部，又南至于甘肃境内的贺兰山尾，再循河水而下，经内蒙，东南入于山西；复南过雁门，逾太行济河水，然后回到宗周^[6]。在西行的过程中，他还访问了不少部族，其中最著名的是西王母部族。《穆天子传》还载有穆王西游所经的一些地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昆仑和春山。神话传说当然不能当作信史，但它却反映先秦时黄河中上游地区与中亚已有所交往，因此才产生这种传说。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作者不详。《山海经》原来是有图有文字，“图”是书的主体，而“经”不过是“图”的说明或注脚，这种“图”是原始地图，可惜未能保存下来，否则更能了解当时人的地理认识。在图散失后，《山海经》的文字部分凡十八卷，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山经》（亦称《五藏山经》），共五卷；第二部分为《海经》，共八卷；第三部分为《大荒经》，并附《海内经》一卷，共五卷。《山经》在《山海经》中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时代写成，记载山川、道里、物产、药物等，是《山海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至于《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虽较为晚出，但杂有神话传说的成分太多，其价值远不及《山经》。晋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有清人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及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

《山海经·北山经》云：“边春之山，多葱、葵、韭、桃、李，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又云：“敦薨之山，其山多棕枏，其下多茝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

《山海经·西山经》云：“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渤海”。“边春之山”，晋代郭璞注：“或作春

山”。清代郝懿行笺疏：“山上多葱，疑即葱岭”。“春”、“葱”音相近，后代也有称葱岭为葱山的^[7]。由此判断，前人认为“边春之山”或“春山”可能指葱岭，还是有一定理由的。“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渤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除引用上述《山海经》的有关记载外并进行描述，据其描述，则“敦薨之山”指天山，“敦薨之水”指开都河，“渤泽”指罗布泊。《山海经·西山经》长沙之山条中的“渤水”，郭璞注：“又音黝，水色黑也”。据此可知，《山海经》称罗布泊为“渤泽”当与水色澄而发黑有关，从湖泊名称也可反映出咸水湖的特征。此外，《山海经·西山经》还提到“昆仑之玉”。总之，通过《山海经》的上述记载，反映当时人们对中亚的一些大河、大湖、大山已有初步的认识。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约在战国，比《山海经》略晚。该书把当时的全国分为九州，采用区域地理方法，记述地理情况，内容包括山脉、河流、藪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是我国最早的地理科学著作。历代研究校释《禹贡》的书较多，著名的有宋程大昌的《禹贡论》及《贡禹山川地理图》，傅寅的《禹贡说断》、清胡渭的《禹贡锥指》等。《禹贡》提到“西被于流沙”，这“流沙”很可能是指玉门关以西的沙漠。《楚辞·招魂》中说：“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楚辞·大招》中也说：“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虽然是文学作品，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西方广大沙漠的原始认识。

二、张骞通西域及《史记·大宛列传》

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北部的匈奴族的奴隶主集团

控制了天山南北，在焉耆（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危须（在博斯腾湖北面）、尉犁（在博斯腾湖西南）之间设“僮仆都尉”，征收赋税，对天山南北几十个城邦和部落进行奴役和剥削。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了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想联络大月氏^[8]，共同抗击匈奴，于是召募使者出使西域^[9]，汉中成固（今陕西成固）人张骞（？—前114年）以郎官应募，遂揭开汉朝通西域的序幕。

张骞率随行人员一百余人从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出发，途经河西走廊时，被匈奴所获，拘禁十余年，终于乘机逃脱，继续西行，翻越葱岭，经大宛（在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锡尔河流域），到大月氏（主要在阿姆河流域）、大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由于当时月氏人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饶，安居乐业，不想再向匈奴报仇。张骞在那里留居一年多，仍达不到结盟的目的，只有取道昆仑山北麓东返，又为匈奴所获^[10]，后乘匈奴内乱，才逃回长安。张骞这次具有地理考察意义的远征，往返前后达十三年，历尽艰险^[11]，获得了有关西域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了他亲身到达的地方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安息、条支等的情况，而且还知道安息以西有犁轩（即罗马共和国）。

张骞西行时，在大夏见到四川出产的邛（在今四川西昌）竹杖、蜀布，闻知来自身毒（印度），根据方向和道里来推测，身毒离四川一定不远；如从四川取道身毒以至大夏，可以避开羌人和匈奴袭击的危险；而且路也近些。他的这一地理推测，引起了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及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永昌道”的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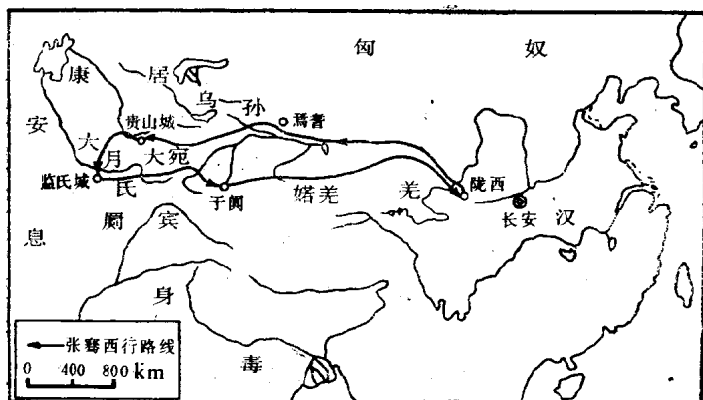


图 1 张骞通西域示意图

元狩二年(前 121 年), 汉武帝派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 为进一步通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元狩四年(前 119 年), 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通西域, 这次主要是为了联络乌孙^[18], 夹攻匈奴。由于这时汉朝已控制河西走廊, 故行程较为顺利。张骞到达乌孙后^[18], 在那里分遣副使数十人, 以乌孙人为导, 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在今新疆和田)、扞罕(即扞弥, 在今新疆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元鼎二年(前 115 年), 张骞回长安, 年余病死。这次通西域虽与乌孙未正式结盟, 但却建立了关系; 他分遣的副使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自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后, 西汉政府不断派遣使者分赴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 这样, 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便逐渐开辟。当时中西交通经过中亚的路线主要有两条: 北道出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北), 沿天山南麓, 经车师前国(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和屯)、焉耆(在今新疆焉耆回族

自治县)、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姑墨(在今新疆温宿)、疏勒(在今新疆喀什);翻越葱岭,到达大月氏或大宛。从大宛再向前进,西北行可至康居、奄蔡。由大月氏向南则进入身毒,向西则达安息。南道出阳关(在敦煌西南),经罗布泊南缘,直趋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罗布泊西北,后迁其南,大致在今新疆若羌境),沿昆仑山北麓,经且末(在今新疆且末西南)、精绝(在今新疆民丰之北尼雅遗址)、扞弥、于阗至皮山(在今新疆皮山),然后分为三支,一支向西南越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至罽宾(今克什米尔);另一支向西行经莎车(在今新疆莎车),逾葱岭,到达大月氏;还有一支由皮山西行经莎车至疏勒,与北道会合。到东汉时又增加了一条路线,即在北道之北的北新道,由阳关向西北走伊吾卢(在今新疆哈密),经车师前国高昌壁(在今吐鲁番东约二十余公里),逾天山,过车师后国(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乌孙。中西交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也促进了地理认识的发展。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14]写《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的见闻来写的,这一地理著作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张骞通过考察所获得对中亚的地理认识。它的认识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对中亚的水系已有极粗略的了解,如它记载“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上述西海指咸海,盐泽即罗布泊。但它说黄河源出自盐泽是错误的。它还记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还进一步派人到于阗考察河源。这样,便在河源的认识上形成了“黄河重源说”,即河源出于阗,由于阗东流至盐泽,

再从盐泽“伏流”而南，然后再出为河源。这种错误的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清末，陶保廉撰《辛卯侍行记》时还采用此说。第二，对当时中亚的一些国家或城邦的地理情况有所了解，由于张骞先到大宛，故一般以大宛为准，对中亚其他国家或城邦距大宛里数、经济性质、人口、兵力、四至、物产、贸易、文字都有所记载，极为翔实可信。如它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罕”。这段记载说明大宛盛产稻、麦和葡萄酒，而且多良马^[15]，反映当时大宛的农业和牧畜业都较发达，对研究费尔干纳盆地的历史地理很有用处。又如它记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疆，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上述记载不仅说明大月氏是个游牧国家，而且简要叙述月氏西迁的过程，是有关大月氏历史的重要资料。至于当时臣服于大月氏的大夏，它是这样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大夏为希腊人所建的国家，后为大月氏所征服^[16]。从“与大宛同俗”来推

测，是农业兼畜牧业的国家，它的人民还善于经商，在都城蓝市城（在今阿富汗巴尔赫）的街道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货物，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大夏的历史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此外，《史记·大宛列传》对乌孙、康居、楼兰、姑师（即车师）等国也有所记载，只不过较为简略，不及上述诸国为详。

《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载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的过程，其中有两点对中亚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说很有意义。其一，它记载李广利在围攻大宛都城贵山城（在今卡散赛）时，因“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17]。其后，“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说明在此以前，费尔干纳地区尚不知造井，而是通过汉人才将穿井技术传到那里。其二，记载李广利征大宛以后，汉在“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募田积粟”。仑头，即轮台（在今新疆轮台附近），地处西域之中，其地“广饶水草”，“良畴美土”^[18]，从地理形势和自然条件来看都较优越，故汉朝在西域兴置屯田首先选择此地。其后，《汉书·西域传》对轮台一带的屯田还有较详的描述。

总之，对于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来说，张骞通西域是一次创举，具有非常重大的地理意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则反映通过张骞的考察对中亚的地理情况已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它的记载大致翔实可信，较先秦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班固的《汉书·西域传》

在征大宛以后，汉朝继续开展对西域的经营。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治所乌垒在今轮台策